

中国全史

名誉主编 张岱年 季羨林  
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

# 新编中国教育史

上册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· 精装合订本 ·

# 新编中国教育史

上册

主编：史仲文 胡晓林

## 本卷书目

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

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

中国秦汉教育史

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

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

（每册均由彩页隔开）

肖川 何雪艳 著

# 中国秦汉教育史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丽华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编中国教育史

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5.9

(百卷本《中国全史》丛书/史仲文，胡晓林主编)

ISBN 7-01-001762-X

I. 新

II. ①史②胡

III. 教育史-中国-古代-民国

IV. G529

### 新编中国教育史

XINBIAN ZHONGGUO JIAOYUSHI

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3 插页8

字数：1400千字 印数：1—250册

定价：119.80元(上、下册)

本书如出现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来函至北京商学院印刷厂调换。

地址：北京阜成路33号 邮编：100037

為百卷本中國全史題

# 百年盛事

張岱年



一九九二年六月

百卷本中國全史  
取精用宏

季羨林



# 中国古代教育的品性与特色

## ——新编中国教育史序言

史仲文 胡晓林

教育,中国自远古即有之。所谓“有人斯可教,有教斯可学,自开辟则既然矣”。中国最早的学校,大约虞舜时已有之,其主要作用在于养老,其名为庠。进入夏代,开始出现以教为主的学校,始称为“校”。孟子说:“校者,教也。”又说“夏曰校”。应当可信。

中国教育的第一次辉煌,始自春秋。春秋以前,学校尚在萌芽。春秋巨变,天下动荡。孔夫子以为“礼崩乐坏”。天下战乱不绝,而学术思想空前活跃。于是个中佼佼者如孔子、墨子,首倡私学,各立门户,成为时代风尚。

春秋教育的发达,一是形式上具有首创性,二是思想上具有开拓性,三是学术上具有独创性,四是表述上具有系统性。孔子不好著述,一生思想,由他的后辈学生整理成《论语》。孔子虽不好著述,《论语》却是有体系的著作。春秋战国时代,大兴文章之风。数百年间,百家争鸣,出现一大批影响极其深远的理论著作,如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种种。这些

著述不但影响了古人，而且影响了今人，还会影响到未来。不但影响了中国，已经影响到世界。

秦汉以后，汉武帝实行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学”的国策之后，汉代教育以经学为主，杂以阴阳思想。教育体制得以统一和完备。汉代教育内容既经规范，教育范围也有扩大，特别是教育与官僚行政体制直接发生联系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

汉代实行官吏选举制。其应选科目包括文学、经学、德行、政治、军事、水利、农事、法令、历算、医学等等。但其主旨仍在经学。

汉代历史很长，东汉、西汉其实有别。西汉的经学虽然也杂以道家和阴阳五行观念，但不像东汉那样拼命在儒学经典中掺入谶纬思想。如果说，西汉为讲天命，儒学理论中已有神学味道。那么东汉为证明刘氏天下绝不能动摇，则把神学迷信抬到很高的地位。但宏观两汉教育，仍以经学为根本。

汉人注经，态度严整，功夫极大。它的功劳在于，第一，搜集、整理、编复了旧有儒学经典；第二，确立了一丝不苟的治经学风；第三，培养了一大批经学博士。它的缺点在于，因为过份强调经学作用，不免思想禁锢；因为盲目迎合谶纬之学，不免迷信四起。大体说来，汉代教育是中国第一次儒学大普及时期，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盛行不衰二千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汉末天下大乱，汉家天下终于不能复兴。经学地位受到严重冲击。于是佛学、道学、玄学之风四起。到了南北朝时代，佛学已经取得重大突破，在大江南北均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，道学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。魏晋南北朝时代可说是儒、道、佛交互成长的时代。但儒学并未衰微，儒学教育依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表现在维护中原文化，保护农业自然经济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，

支持国家走向统一方面,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学说不能代替的历史性作用。但旧的教育体制确实无法继续下去了。

隋朝统一天下,创立科举制。唐王朝盛况空前。而唐承隋制,进一步肯定和完善科举制度。在指导思想允许儒、道、佛共同发展,在教育方面仍以儒学为本。

唐代思想开明,文化兴旺,经济发达,国力强盛,唐时教育貌似汉代,又形成自己的特色。唐代不但重视儒学,对于法学、算学、医学、律学、书学以及未入科考却深受人们欢迎的文选学,都给予足够重视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唐代因为经济发达,工商业十分繁荣。唐王朝专门规定对官府工匠予以一定的学习和训练时间。那方法,颇有些古代职业教育的味道。而且,因为国力强盛,皇家好武,所以文科之外,还曾经开办武举。

唐代教育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盛唐文化特色。

宋代教育,科考与书院并兴,宋代教育体制继承隋唐传统。宋代自己的教育特色,则是书院的兴起。书院原非宋人发明,但将书院作为传授知识的学校并获得巨大社会影响,则始于宋代。北宋有四大书院,即白鹿、石鼓(一说嵩阳)、应天、岳麓书院,可说名闻四海、意义非凡。宋代书院固以讲授儒学为本,但对传统儒学实有新的补充和创造。朱熹确定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体系,就是这种创造的典型标志。《四书》非宋人所作,但朱熹慧眼识真,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特地从《礼记》中取出来,配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合称四书。这其实是对传统儒学体系的一个结构性改造。因为任何一个事物,其内在构因的组合不同,都会使这个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。比如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,同样两张画面,一哭一笑,但在剪接上,只须把两张画面的前后顺序颠倒一下,所反映的意思就会截然不同。先哭后笑,即所谓破涕为笑,先笑后哭,

则是乐极生悲。

宋代书院，以讲授学问为主，不以赢利为本。一些倡导书院的大师，甚至指责科举，也不教授诗词歌赋。因为有这样的气度和要求，宋代确实造就一批大儒。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，宋代学院本是研究学问的所在，而宋代学院的研究成果，却成为明清思想专制的文化工具。这也说明宋明儒学自有其先天不足和历史局限的方面。

宋代另一特别值得一书的教育成果是启蒙读物十分发达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儿童启蒙书如王应麟的《三字经》，语言浅显，内容丰富，音节响亮，琅琅上口。一直到民国时期，许多乡间村塾还将其作为基本教材。其余如《百家姓》、《儿童识字读本》也是传播极广的启蒙读物。所以如此者，因为彼时的大儒，对儿童教育十分关注，朱熹曾亲作《小学》，以大手笔作入面书，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元人轻视儒生，有九儒十丐之说。但它既入中原，终于不避科举之路，不改尊孔之道。虽然如此，因为它实行种族歧视政策，尽管保存了宋代教育的几乎所有形式，其历史成绩依然不免大为逊色。但元人重医学，其医学流派十分发达，较之宋代更有发展。

明清两代属于科举专制时代。虽然明清多有大儒，但从整个科举教育体系考察，这是一个专制的时代，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没落之秋。其科举教育的最大弊端，是朱元璋钦定的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考制度。八股文本身就是一种僵化不能进行自由创造的文章体式，但它在明清两代，却成了知识分子入仕的必修课。以此可知科举制到了明清时代，已丧失其固有的进步含义。明清科考造就一大批《儒林外史》上的人物。好在自明以后，近代科学已

经渐入中华。中国最早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也在明末清初登上中国文化教育舞台。明清大儒，颇有一些接受西学的人物，而1840年之后，中国固有的教育已经无法守住自己的阵地。外面由渗入而突入，内部由小变而大变，内外夹击，首尾生变，终于于1908年由慈禧宣布废除科举制度。

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以北大、清华为代表的中国教育，出现前所未闻的历史局面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清华、北大，名师云集，声高振远。所谓：

“故国者，非固有老树，因有老臣也。

大学者，非固有大楼，因有大师也。”

诸如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周作人、王国维、鲁迅、陈寅恪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金岳霖、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冯友兰等人都在清华、北大任过教席。这些大师级教员中，政治立场或大相径庭，所习专业或各有所本、各见所长，但论其学识文章，个个都有独特的发现和建树。可以这样说，当时清华、北大的学术水平，特别是它们在文、史、哲等方面的学识水平，已经接近或进入世界先进行列；它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培养的专业人才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这时是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教育史上的再度辉煌的时期。可惜的是，因为战乱频仍，政治斗争无比激烈，以北大、清华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史上的再度辉煌，存在时间十分短暂，不幸成为辉煌的瞬间。

中国教育历史既长，取得的成就也大。中国教育史与西方教育史的最大不同之处，在于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世俗性国家。虽然远古时代，教育或发端于民间宗教的活动，但自周秦以降，总是以世俗学问特别是儒学为主导。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大黑暗，中国传统教育其有力焉。

中国教育曾经取得诸多成就,简而言之,或可概括为四个基本方面。

从教育主体考虑,中国是一个历代皆有杰出人才的国家。最大的教育名人自然是孔子。但孔子不是孤立存在的,与他同时代,即有墨子与之抗衡。在他身后,荀、孟皆为教育名家,孟子更以嫡传自命,继承他的“衣钵”。诸子百家,或许可说家家皆有教育,儒、墨、道、法,不过是其中的显学而已。但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,最为特殊也最为显赫。随着历史的演进,他的师名日益提高,远胜生时;而且终整个中国古代社会,也没有人超过他。

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。对当时所有的与教育相关的问题他几乎无不涉及。他的“因材施教”思想,“有教无类”思想,“诲人不倦”思想,“多闻”与“不耻下问”思想,“学而时习之”思想,学思并重思想,从善弃恶思想等等,特别是他的道德理想和他本人终身好学的不倦的精神,都为儒学后人奉为圭臬,千秋景仰。记述他一生主要言论的《论语》一书,几乎全部由格言组成,其中许多名言警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结构。

孔子之外,墨、老、庄、孟、荀、韩等人都在先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而且他们的著作同样是历两千年而不朽的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文献。

先秦以降,汉有董仲舒、王充;魏晋南北朝有范缜、傅玄、颜之推;唐有孔显达、韩愈;宋有程、周、张、朱和陆九渊;元有许衡、吴澄、郑玉;明有王守仁、李贽、王廷相;清有王夫之、颜元、戴震、康有为、梁启超,民国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英华。他们虽然所处时代不同,个性有异,但作为该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,都对自己的时代作出过卓越的贡献。

从教育制度方面考虑,中国在人类教育史上也有自己的独

特创造。中国古代教育思路，自西汉之后，可谓一脉相承，就是宗儒敬礼、重礼读经。但具体教育体制，则有多次变化。特别值得记述的，是中国古代的私人办学、人才选举制和科举制度。

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讲学办学，春秋战国与宋明时代最具特色。而中国古代的教育硕儒也多生于这两个时代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，不但称冠中华，而且远播海外。

但比较这两个时代，它们却各有特色。春秋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，百家争鸣，儒家只是一家之言。虽只一家之言，孔子的学高识远，孟子的雄辩通达，荀子的严谨精辟，皆为古代文学之翘楚，思想之巨匠，宋明理学则属于一个再创造时代。春秋战国时儒学处于开创时期，独以思想取胜；宋明理学处于总结转折时期，仅以学问取胜。虽然学识功底深厚，思想不免趋于僵化。中国古代私人办学给后人的启迪是：教育乃是一项最需要创造性的事业，虽然它所教授给学生的应该是得到认可的知识，而它的内在精神却是生气勃勃、富于挑战性的。

人才选举制度的产生和完善，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次大转变。先秦时代，教育与政府没有必然联系。士人作用固大，但要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。孔门自古多贤人，贤人尽管贤人，不能因此就保证你有官可做，更不能保证你取得为官方承认的特殊身份。管理者一方，并没有学派远近之别，但觉有益，便思采纳；学派本身，也不以诸侯的政治权力为生存靠山，只望货卖识家。双方都有自由，可以双向选择。

汉代之后，实行选举制，即由地方官向朝廷推举人才。西汉的选举制即包括征辟、举荐、考试、特诏四种形式。四种形式皆以选举为其主调。

汉代兴办官学，也允许私人办学，一方面是国家确立人才选

举制度,一方面又兴办官学,允许私学。二者结合起来,就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官吏选拔与教育制度相结合的教育体制。这种教育体制,将教育牢牢地捆在国家行政体系的长车之上。这种教育体制,对于汉代的兴旺,起了很大作用。随着汉代的衰落,也日益显得力不从心。而且经过近400年,确实也使经学研究钻进了死胡同。教育的勃兴,只能另觅他途。

选举制的最后衰变,开始于魏文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。九品中正制的特点就是门第第一,才德第二。第二自然拗不过第一,九品中正制很快成为特权阶层腐败的标志。曹孟德开基创业,主张唯才是举,曹丕确立九品中正制,只看门第,不问人才,可说播下龙种,生出跳蚤,悲夫。人才选举制蜕变为九品中正制,证明这种制度已到穷途末路。

选举制灭亡,科举制代之而起。科举制初创于隋代,成熟于唐代。科举制的特点,是以科考取士。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制度化。这种制度比之以门阀为本的九品中正制,比之以举荐为特色的选举制自然是一大进步。它为中国的知识分子,主要是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找到进身之门,使他们可以通过科考,达到跻身官场的目的。

科举制以仕途为号召,为唐王朝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,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对唐代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大帝国,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中世纪那种历史命运,其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。正是这种制度,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封建帝国的兴衰际遇紧紧联在一起。

科举制风行约1000年后,到明代朱元璋时发生恶性蜕变。朱元璋保留科举形式,改变科考方式,决定以八股取士。从此八

股文成为一门专门用来考取功名的学问。八股文禁锢人的思想，束缚知识分子的首创精神，八股文和中国古代女人缠小脚，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两大痼疾。八股文也是一种小脚，使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变成只知白首穷经，不知时务，不求真知的精神残废人。

科举制经八股一变，同样证明这种制度也走进了死胡同

从教育的社会地位考虑，中国古有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。孔子周游列国，虽然他不曾为自己的学识找到真正的知音，但大抵走到哪里，就有国君接见。由此可知他的社会地位其实不同凡响。所以如此，和当时社会重视士人尤其重视士人之师的风气有直接关系。绝不像后来那样，没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哪怕你是特大的知识分子，要见皇帝也绝非易事。

尊师重道，自汉取天下以后，仍然有所加强。刘邦马上得天下，最是轻贱儒生。史传他见到儒生就有气，有时竟用儒生的帽子撒尿。当时的一位儒学说客郦食其要求见他。他一听郦是儒生，马上说不见，郦生脾气很大，说老子乃高阳酒徒，不是儒生。他即刻改变态度，与郦食其相见，可见在他心目中，儒生尚且不及酒徒。但刘邦既得天下，便觉出不想点办法整治朝政真不得了。于是陆贾、叔孙通向他建议，劝他采纳儒家礼仪，以正朝风。后来一试，果然灵验。于是他对儒学改变看法，对孔夫子也表示了尊重。汉武帝时，儒家地位进入独尊状态，师倍得敬，道倍得行。所谓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”，虽然不过是儒家学者的一种理想，毕竟为人师长有所不同。

师与道，二者其实不可分离。无道即不能为师，无师又何以传道。唐代卫道者韩愈，对此别有研究。他说：“师者，传道解惑受业者也。”他主张学以明道，师以传道，文以载道。虽然他本人

对道的理解算不上深刻,但那执着追求以道统自命的精神,确实无愧儒者风范。

中国古来尊师重道,从理论上讲,纵然贵为皇帝也不能无师。在很多情况下,确实也有些帝王尊师的佳话。光绪皇帝和翁同龢,不但师生情谊很厚,而且政见也颇为相似。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暴虐皇帝,在对待师者的态度上也不能不有所顾忌。他的一位王子,因为学习不用功,让老师打了一下,就跑到朱元璋那里去告状,他一听,脸变长了。马皇后劝他说:“先生用圣人的道理管教孩子,怎么能动怒呢?”他听了,便不再计较此事。

应该说明的是,中国封建时代对教师的尊重是有限的,对道的理解也往往是实用主义的,这一点,我们稍后再讲。

从教育的价值追求考虑,中国传统教育更重视自身修养。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之一,是重视伦理道德教育,且教育者首先应身体力行。对被教者同样要求严格,一丝不苟。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精神支柱在于宗教,中国历史上宗教未曾取得主导地位,但又不能没有精神作支撑,于是自汉武帝起,儒家的道德学说,在中国就有了宗教性含义。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,尽管中途有过起伏涨落,总的趋势则是愈演愈烈。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,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核心内容,成为古代中国立法的基础,作人的根本;表现在教育中更是反复强调,必须身体力行的事情。

因此,教育者的以身作则就成为一项毋庸置疑的要求。孔夫子本人就是洁身自好的。因为他看望过南子。南子漂亮,孔子博学,引起某些学生的嘀嘀咕咕,于是夫子发誓说,若是那样,“天厌之,天厌之”。孔子的学生中,修养最好的,自属颜回。颜回有举一反三的德行,言行未曾不合儒学本义。曾参做得也不错,好像不如颜回那样自如,但能刻苦努力,“吾一日三省吾身”。

儒学教育的这个传统，代代相传不止。宋明理学的几位大师，个个继承先贤本色。周敦颐曾作《爱莲说》，赞扬莲花独能出于污泥而不染，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人格理想和自身行为的写照。程氏兄弟个性不同，大程谦和，小程严整。与大程交，如沐春风；向小程求学，难免程门立雪。小程严厉，不怒而威，他曾因党争之故被逐他乡，不想在汉江遇恶风，船只堪堪沉没，船上乘客骤临此变，一时哭声四起，唯程颐正襟危坐，不为所动。所幸未曾翻船，事后一老人问他何以能如此，他回答说：“心存诚敬耳。”

宋明几位理学大师，论其文采、词章亦不十分出色。比起欧阳修、苏东坡，他们在文的艺术，不免落入二流。仕途亦不算安顺，更不似王安石那样曾经权倾天下，官声赫赫。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力，在当时和其后很长时间内，都高过宋代文坛诗坛词坛的几大家去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卫道精神。有朱熹为朱子“行状”的文字，最能画出朱熹的风仪神态：

“其闲居也，未明而起，深衣幅巾方履，拜于家庙，以及先圣。退坐书室，几案必正，书籍器用必整。其饮食也，羹食行列有定位，匙箸举措有定向。倦而休也，瞑目端坐。休尔起也，整步徐行。中夜而寝，既寝而寤，则拥衾而坐，或至达旦。威仪容止之则，自少至老，祁寒盛暑，造次颠沛，未尝有须臾之离也。”

先生自身如此，教学生同样严格。广而及之，对一切人的评价都使用这种儒者风范。观人先观其德。有德者赞之，无德者诫之。此风愈演愈烈，到了后来，终于弄出“24孝”之类的玩艺来。教育孩子先要老成，三岁也知让梨，七岁更知敬父孝母。一切行为，礼义当先；宁使人负我，我决不负人。即使绝交，也要保持君子之风——“君子绝交，口不出恶声”。这种以强调道德和道德修